

当代学者文丛

孙孺纪念文集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广东省经济学会 编

主编：曾牧野 李子彪 梁桂全 宋子和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儒纪念文集 / 曾牧野等主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8

(当代学者文丛 / 张振金主编)

ISBN 7-5034-1682-3

I. 孙... II. 曾... III. 孙儒 - 纪念文集

IV. K825.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78371号

责任编辑: 刘剑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印刷: 广东科普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6.75

字数: 135千字

版次: 2005年8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05年8月第1次印刷

总定价: 250.00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孙孺纪念文集

编委会

主编：曾牧野 李子彪 梁桂全 宋子和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 力、方志钦、王经伦、王 珺、丘 杉、
田 丰、刘品安、刘艳芬、向晓梅、许宁英、
许 隆、吴蓬生、张志铮、张振金、张难生、
张 绰、张 磊、李 中、李鸿生、李新家、
杨 奇、杨 樾、陈一民、陈 明、麦 扬、
罗福群、郁 方、施汉荣、赵元浩、徐德志、
梁 钊、黄 彦、黄明同、黄家驹、黄铁苗、
黄德鸿、游霭琼、雷比璐、赖伯疆、谭 军

编辑部工作人员：

蒙秋雅、姚丽梅、袁向明

目 录

CONTENTS

学习孙孺同志的献身精神 为繁荣发展社会科学事业而努力 ——在“孙孺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李子彪	3
为追求真理而战斗的一生 ——追忆亲密的战友、老师、亲爱的丈夫孙孺 ·····陈 明	9
永远的怀念 ——献给亲爱的父亲 ·····杰曜 杰晖 杰 杰昭 杰明 小茹 小薇	22
怀念孙孺叔叔·····孙炳达	32
难忘兄师两分情 ——深切怀念经济学家孙孺表兄·····周绍华	34
怀念老战友——孙孺·····赵元浩	39
革命家·作家·经济学家 ——怀念孙孺同志·····麦 扬	41
令人敬仰的社会科学事业的拓荒者·····曾牧野	46

难忘的记忆·····	张 磊	51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李 中	53
学习老会长把经济学会工作做好·····	宋子和	56
团结协作 注重调研·····	马思成	59
回忆孙孺的一次学术报告·····	张 井	61
怀念孙孺同志·····	陈一民	65
孙孺同志是我们的好上级、好战友、好导师·····	张 屏	68
永远怀念孙孺同志·····	陈胜华	73
回忆老领导孙孺同志·····	张清明	76
才华横溢的孙孺同志·····	林燮襄	78
缅怀孙孺同志的开拓性贡献·····	施汉荣	81
追怀孙孺老院长感赋·····	方志钦	86
一颗热情洋溢周密细致的侨心		
——孙孺同志与侨史学会·····	廖 钱	88
深情怀念孙孺同志·····	张 绰	94
孙孺：归侨作家的一面旗帜·····	陈秋舫	101
良师益友与榜样		
——深切怀念孙孺同志·····	罗福群	106
一分厚重的精神遗产		
——孙孺同志经济思想概述·····	郑栋才	110
学识渊博、平易近人		
——怀念孙孺同志·····	张志铮	118
勤奋工作严谨治学精神永存·····	文武汉	120
作为文学家的孙孺同志·····	赖伯疆	127
经济学家也是作家		

——纪念孙孺同志·····	张振金	132
寻真		
——悼念孙孺老院长·····	王 杰	136
大师风范：骨气良知谦逊兼容·····	吴蓬生	138
为党的事业勤奋工作的孙孺同志·····	蒋祖缘	141
孙孺同志：可亲可敬 亦师亦友·····	丁培强	144
学习孙孺同志崇高品德弘扬献身社会科学事业精神 ·····	朱慧强	147
好领导 好老师——孙孺同志·····	雷 强	151
我心目中的孙孺同志·····	陈家义	154
忆孙孺同志主持编书·····	周治平	158
坚持真理、和蔼可亲的好领导·····	曾宪仪	160
我省学界隆重纪念著名经济学家孙孺·····	雷渡桥	163
漫卷诗书寄我情		
——广东省社科界聚会纪念孙孺同志九十诞辰·····	邓利方	164
孙孺同志追悼会悼词 ·····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党组	167
痛悼孙孺同志·····	卓 炯 曾牧野	172
左联诗人·马华作家·东纵战士		
——怀念孙冰同志·····	谭 军	175
从华侨作家到经济学家·····	李克华	185
深切怀念孙孺同志·····	曾牧野	200

学习孙孺同志的献身精神 为繁荣发展社会科学事业而努力

——在“孙孺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 李子彪

2004年6月28日

同志们：

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非常重视。最近，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我们要通过各种方式贯彻落实党中央《意见》的精神，使广东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今天，我们邀请院内外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参加座谈会，纪念我省著名经济学家孙孺同志诞辰九十周年；通过纪念活动进一步弘扬老一辈社会科学工作者献身社会科学的精神，激励后一辈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扎扎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为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贡献我们的力量。

孙孺同志是我院的创建人之一，也是我省著名的经济学家。1914年出生于新加坡，祖籍是广东省兴宁市，14岁时回到广东梅县读中学，毕业后再回到新加坡。在三十年代，孙孺同志主要从事文艺创作。1933年从马来亚到上海，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领导组织的中国诗歌会，继续从事文艺工作。1935年到1936年，孙孺同志到日本留学，除继续从事文艺创作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东京中央大学就读政治经济学专攻班，学习了马克思

的《资本论》以及苏联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等论著。1936年从东京回到马来亚后，是孙孺同志创作的旺盛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发表了许多戏剧作品以及小说、散文。

1940年，孙孺同志从马来亚回国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即后来的东江纵队，在部队中主要从事宣传工作并领导了“东江流动剧团”。1943年，他在东江纵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底，党组织派他到香港《正报》工作，1947年又被派到《华商报》工作，从这时起，他开始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在党组织的指示下，他还与赵元浩、麦扬等同志创办了《经济导报》。

广州解放后，孙孺同志从香港回到内地，从事广东省的外贸管理工作，先后担任广东省外贸局处长、副局长。1958年8月，孙孺同志调任刚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前身）副所长，所长由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副院长杜国庠兼任，全所的领导工作实际由他一个人承担。孙孺同志从1958年到1987年6月15日逝世，一直从事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管理和经济学的研究工作。

半个世纪以来，孙孺同志无论在东南亚、香港还是在国内，都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勤奋工作。他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成就一行，所从事的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就。

——孙孺同志作为旅居东南亚的华侨作家，在三十年代先后以“流冰”、“高杨”、“夏风”、“刘宾”、“夏枫”、“高风”等笔名发表了过百篇的小说、诗歌、戏剧和文艺理论等文章。1940年他出版了独幕话剧集《中国海的怒潮》。1972年，新加坡著名的新马华文文学作家方修主编的《马华文学六十年丛书》还选编出版了孙孺的《流冰作品选》一书，方修先生在该书前言中对孙孺三十年代在新马文学活动的成就作了很高的评价，称誉流冰（孙孺）是三十年代最活跃的作家之一，认为流冰的写

作面既广，作品也多，多而不滥。

——孙孺同志作为新闻工作者，敬业、勤奋。他在香港《华商报》担任记者和编辑期间，与赵元浩同志负责经济版，每天出半版，大部分文章都由他们两个人撰写，每周还要写一篇评论香港市场的文章。为办好由他们亲手创办的《经济导报》，孙孺十分注意研究当时香港的贸易情况，常在文章中提出问题并指出前途和方向，同时，大力宣传我党在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对外贸易的方针政策。

——孙孺同志作为外贸管理工作，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和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筹办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五十年代初，当时正处于抗美援朝时期，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他当时担任广东省外贸部门的进出口处处长，他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想方设法把私商组织起来，重点从香港进口汽车、汽油、橡胶等战略物资，支持和配合了抗美援朝斗争和新中国建设的需要。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孙孺同志在筹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所作的努力。他在1954年和1955年参与筹办了两次广东出口物资交流会，他认真地总结了举办物资交流会的经验，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形式，积极建议要扩大规模，定期举行。后经外贸部研究，认为不仅广东要搞，全国也要搞。于是决定举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孙孺同志在参与筹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的过程中，又提出了从展览会成交额中抽千分之三作经费建场馆的建议。后来广州海珠广场的交易会大楼就是用这种方法筹集资金建造起来的。

——孙孺同志作为地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创办人和领导干部，更是为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重要贡献。我院前身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是全国较早建立的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之一，如何办好地方院所，这是孙孺同志到任后思考的首要问题。为此，他曾几次请教当时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同志。根据周扬同志的指示，他决心把中

科院广州社科所办成具有广东特色的地方所。他指导各个研究室制定规划和方向，如历史室确定以研究孙中山、康梁、辛亥革命为主。历史室尽管在“文革”前成果不多，但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成为全国研究孙中山问题的中心。孙孺同志还要求每个研究人员都要读10本书，即《马恩选集》2本（当时马恩选集只有第一二卷），《列宁选集》4本，《毛泽东选集》4本，经济室的同志还要读《资本论》。有人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是“省社科院大发展新时期”，产生、出版了大量有社会效益的科研成果。我完全同意这样的评价。但是，我想作一点重要的补充，改革开放时期我院的部分领导成员以及重要的学术骨干，都是六十、七十年代在孙孺同志的领导与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孙孺同志长期主管全所（院）的科研工作，并兼任经济所所长，对如何办好地方院所和搞好科研管理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孙孺同志作为经济学家，在研究工作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从事经济学研究是四十年代中期、从党组织派他到《华商报》工作开始。一边在《华商报》经济版和《经济导报》从事编辑工作，一边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着重研究国际经济贸易方面的问题。在报社工作期间，孙孺同志写了大量有关经济学理论和香港经济问题的文章。1958年调入中科院广州社科所后，尽管行政事务繁忙，但还是坚持挤时间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他与卓炯同志合作主编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讲话（资本主义部分）》、编写了《雇佣劳动与资本解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主编了《前进中的中国经济特区》（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与许隆同志主编《中国经济特区的理论与实践》等。孙孺同志去世后，我院组织编辑出版了《孙孺经济论文选》，该书选编了孙孺同志撰写的五十多篇论文。

——孙孺同志作为知名的社会活动家，除了自身的本职工作以外，积极参加重大的社会活动。他是广东省政协第三、四、

五、六届委员、省社科联副主席、省侨联常委、顾问，并担任了广东归侨作家联谊会理事长和华侨史学会会长等职。他是广东经济学会与《南方经济》杂志社的创办人，长期担任会长，关怀《南方经济》的出版，为团结、组织经济界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同心协力地研究、探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以及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为繁荣发展我省社会科学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孙孺同志不愧为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优秀领导干部和著名学者，他在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领导干部和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学习。

孙孺同志勤奋好学，对工作任劳任怨。他干一行，学一行，干好一行。他年青时撰写、发表那么多的文艺作品要靠勤奋，年老时著书立说不停步，靠的是勤奋。科研成果累累更要勤奋。他认为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主要靠自学，二是半路出家。”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他从事经济学研究的艰辛。他不仅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自学经济学的原理，而且所研究的课题往往都是比较新的问题，如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问题、人民公社问题、创建经济特区问题等等，这都需要善于学习，刻苦钻研。特别是他年老时体弱多病，还身兼数职，出版了那么多著作，确实难能可贵。

孙孺同志敢于坚持真理，立场坚定，同时又善于团结不同观点的学者一起共事。六十年代，著名经济学家卓炯由于坚持商品经济的观点受到非议，有关领导要孙孺同志组织对卓炯进行批判，但孙孺同志不同意这样做，认为搞科学研究应允许不同的学术观点存在，不能因此整人，硬是拖着不办；七十年代，孙孺同志主持编写《反杜林论》辅导材料，有个别领导指示要在辅导材料中批判“唯生产办论”，孙孺同志坚决不予采纳；八十年代，有人对办经济特区提出置疑，孙孺同志多次到经济特区进行调查

研究，接连发表了几篇论文阐明自己的观点，深刻阐述举办经济特区的重大意义。卓炯同志的观点在六十年代是少数派，与经济学界众多同志的观点不大一致，但孙儒同志还是把卓炯同志从原单位“要”来。“文革”一来，有人抓住此事大做反面文章，攻击孙儒大搞“招降纳叛”。孙卓合作共事几十年，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在经济学界传为佳话。

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正处于大发展的时期。我们要珍惜这难得的机遇，切实抓住机遇，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优良品格和献身科学的精神，把队伍建设好；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服务大局，加强建设，潜心研究，有所作为，开创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为追求真理而战斗的一生

——追忆亲密的战友、老师、亲爱的丈夫孙孺

陈明

孙孺，字若文，原名孙文林，曾用名孙流冰、孙冰。祖籍广东兴宁县，1914年7月1日出生于新加坡。父母是侨居新加坡、马来亚的华侨手工业工人，家境贫穷。幸有侨办学校提倡平民教育，每月只收学费五毛，他才有机会于六岁开始上学。

1922年到1923年他与妹妹随母回到家乡。因生活困难，勉强在乡村小学就读。

1924年返回新加坡，继续在一间平民学校读书至1927年。在这三年里，学校对他灌输了单纯的爱国思想，对孙中山很敬仰。

离开平民学校的时候，在校长的帮助下，得到梅县县立师范学校免收学费的优惠，校长本人还给予了旅费的资助，他于1928年初回梅县，在县立师范学校就读，1929年在该校毕业后，又返回新加坡。

在他回梅县时，正是广州起义后不到一个月，是国民党血腥统治时期。当他踏入国门汕头，就感到政治气氛很紧张，但当时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在梅县读书时，他对政治还是没有多少认识，也没有多大的兴趣，并觉得学校里的老师讲授三民主义的课

讲得枯燥无味。当时他爱好的是文艺，读了不少文艺作品，但只是凭个人爱好去读，没有政治见解。后因“五、卅”济南惨案发生，触醒了他，使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产生了仇恨心。

那时，在梅县县城经常都枪毙“共产党”。为什么会这样，他当时还不太清楚，但对这种屠杀却很反感。尤其是与学校相邻的国民党党部，经常在夜晚审讯“犯人”，那种惨叫声使人心寒，他觉得这样太无人道了。这时他对共产党并不了解，而对小说中描写的革命青年则是敬仰的。

在师范学校学习结束的那一个学期末，县政府突然下令撤换他们的校长，校长不肯交权，学生分成两派，闹起风潮，于是县政府派兵强行接管学校，结果开枪打死了两名学生。从此，他对国民党政府产生了反感。学生何辜？竟遭枪杀？

1929年，他从师范学校毕业，必须离开学校。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踌躇不安地踏上返回侨居地新加坡的归途，去另谋出路。这一年他十五岁，原来脑子里萌生的单纯的爱国思想，这时已渗透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国民党的反感。在归途中，他阅读一本他在动身前买的洪灵菲写的小说《转变》，这部小说描写了国民党统治当局如何屠杀革命青年，青年男女们如何转变思想，参加了革命。当时，这部小说对他启发很大，打开了他的心扉，心胸顿觉开朗，对在国内读书时耳闻目睹的许多事情，有了一个较清楚的是非界线，思想开始转变，对国民党的统治产生了不满，对革命有了一个新的认识，知道她能促使社会进步，也知道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从而初步确立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倾向。

1929年秋到1932年下学期，他在侨居地过着小学教师的生活。在这期间，结识了一些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后逃亡到海外的革命青年，从他们那里知道了不少有关苏联的情况及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开始对社会主义革命有了一些认识。由于受到革命思想影

响，他在这个时期读了许多国内外左倾进步的名著和翻译小说，较深刻地懂得了资产阶级如何剥削压迫工人和用宗教麻醉人民。在这个时期，他开始拿起笔杆，经常写一些诗歌、小说、散文和杂文在报章上发表，其中不少是描写工人如何遭受剥削和压迫的。这时，他为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叫“流冰”，后因他作品越来越多，并受到了重视，“流冰”这个笔名渐渐成了他的名字，原来的名字反而很少人知道了。

1933年秋，他得到族亲的资助，又回到国内，在上海的一所专科学校继续读书。这时，他认识了黄蒲风，并加入了当时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的“中国诗歌会”。在诗歌会里，他的主要工作是和黄蒲风一起搞《新诗歌》这个刊物的出版。同时，他也在上海一间交通职工子女学校任教过一年。这个时期，他的最大兴趣仍然是文学，思想上赞成进步的大众革命文学，陆续写了许多文章在报章杂志上发表，大都是以南洋工人的生活为题材。

大约是1934年秋，“中国诗歌会”遭到国民党迫害和破坏，几个主持者被捕，黄蒲风逃亡日本。1935年上学期，他所任教的学校校长、他的好友郑天保先生因失去了支持人，同时也因为郑天保先生在他所写的校歌里有“劳工，劳工，世界主人翁……”的歌词，校长的职位终于被撤了。孙流冰也随之辞职，和郑天保先生一同到日本去。

1935年秋到1936年夏，他在日本东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学专攻班”学习，在这段时间，他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苏联列昂节夫著的《政治经济学》等论著。同时，他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的留东同学“诗歌座谈会”和“戏剧座谈会”，并担任干事，从事文艺宣传工作。这时新文字运动已开始，他因编写了“客家话拉丁化方案”的小册子，引起了日本警视厅的注意，不久他便离开日本返回马来亚。

1936年下半年到1940年秋，孙流冰在马来亚各地的中小学校

任教，同时积极从事文艺写作。“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参加了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马来亚各界华侨抗敌后援会”和“马六甲华侨抗敌后援会”的领导工作，并担任了秘密组织“马六甲华侨援助八路军新四军委员会”主席。为了扩大对工农群众的抗日宣传，他积极主动地组织和带领宣传队深入到城郊、村镇，亲自登台演讲，动员侨团、工商界及广大工农侨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祖国抗战。同时，他发表了许多有关抗日战争的戏剧、小说、散文、杂文和文艺评论等文章，出版了独幕剧集《中国海的怒潮》，拿起笔杆进行战斗。当时，他的宣传和作品赢得了高度的赞誉。这是他投身于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和文艺创作的旺盛时期。1984年在新加坡出版的《新马华文作家群象》中，孙流冰被列入1919-1942时期“战前殖民号龙舟的划桨人”之一，并以“文艺界巨擘——流冰”为题作了专门的介绍。新加坡出版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选入了他的部分文章。1979年由方修主编的《马华文学六十年》（1919-1979）又选编出版了《流冰作品选》一书。方修先生在该书的前言中，对“流冰”在三十年的新马文学活动中所取得的成就作了很高评价，称誉“流冰是三十年代联邦方面最活跃的作家之一，……流冰的写作面既广，作品的产量也多，但却是多而不滥。他所写的东西，都是那些需要写或值得写的。”

进入1940年，马来亚各地华侨社团，特别是广大城乡工农商群众，支援祖国抗日战争的行动积极、情绪高昂，抗日宣传运动蓬勃发展，触怒了英帝殖民统治当局。于是，殖民当局对抗日积极分子采取了逮捕、拘押的手段。孙流冰于当年暑期被逮捕，监禁三个月后，被押往新加坡、香港，进而押解出境到了祖国广东。

孙流冰被押解出境回到祖国广东，正是1940年10月，他随即以孙冰的名字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

即后来的东江纵队，双手同时擎起枪杆和笔杆，面对来犯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进行战斗。刚到部队时，他争取时间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延安整风开始后，他看了不少整风文件，对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从此，孙冰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教育下，在革命队伍里，在艰苦危险的抗日游击战斗生活中，思想更加成熟了，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他真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真正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政党，抗日战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胜利，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革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完成，要实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彻底解放中国人民，思想中有了入党的要求。1943年1月，孙冰在部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孙冰在部队一直负责宣传工作，尽心尽力，不论对内对外、对我对敌的宣传工作都收到一定的成效。在政治处期间他还亲自组织和领导“东江流动剧团”，写了不少剧本供剧团演出，效果极佳，最具代表性的是由他编撰和执导的话剧《路西一年》，热情讴歌了东江纵队成立后的一九四四年抗日根据地军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同时他也写小说、诗歌、散文等，因为当时的条件所限，他的这些作品都没能保存下来。

1945年日本投降后，1946年部队北撤，孙冰接受党的决定，到香港工作，从此改名孙孺。

1946年—1949年10月，孙孺在香港，先在党办的《正报》工作，1947年调《华商报》，任经济版记者、编辑，同时参加创办《经济导报》，曾任该报编委，主编。从此，他放弃了文艺，转而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

在《华商报》经济版工作期间，他撰写了大量的经济文章，着重评述香港市场，向工商界指出香港市场的现状，发展的前途方向；介绍我解放区的对外经济贸易方针政策；担负工商界的统